

生态文明视阈下的精准扶贫

——以湖北省宜昌市为例

王芳 黄军^{*1}

（华东理工大学，上海 200237）

【摘要】：贫困不仅是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还是发展的问题。人类的历史进程就是人类不断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反抗“贫困”的实践史，在这一过程中人类不断深化对“贫困”和“发展”的理解。湖北宜昌市在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引下不断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精准地更新了发展理念，精准地寻找了贫困地区的生态适应位，精准地把握了贫困地区的实践能力——资源系统矩阵，精准地创造了贫困地区发展的内外环境，科学地构建了精准扶贫的评估体系，最终使得宜昌市实现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精准扶贫在实践中的互动与支撑。

【关键词】：生态文明；发展；贫困；精准扶贫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8)01-0081-07

生态文明建设与精准扶贫内在的统一于中国特色的反抗贫困实践中，是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实现小康目标的重要保障。在一定意义上，精准扶贫不仅是发展理念的更新，还是中国在建设生态文明进程中反抗贫困的伟大实践，这有助于构建兼具中国特色和国际意义的扶贫发展理论体系。湖北省宜昌市在这场扶贫攻坚战中，通过产业扶贫、扶贫搬迁和整村推进等专项扶贫工程不仅提高了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收入和幸福感，同时也守住了宜昌的“青山绿水”。

一、贫困与发展：从生命维持到生态发展

“贫困”和“发展”问题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都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人类的发展历史就是人类不断反抗贫困、寻求生态平衡并不断拓展人类活动空间的过程。人类在不断地反抗物质贫困、精神贫困和生态贫困的过程中谋取自身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人类的发展史也就是一部不断创造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以及生态财富的反贫困史。

1 “生命维持”到“经济发展”。

学术界对“贫困”的理解和界定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动态过程，开始时大家几乎都从物质层面进行思考，认为贫困是人类生存空间的不足和生存环境的恶化，其强调物质和收入的重要性，然后再扩展到个人能力层面和权利层面。关于对“贫困”的理解和思考，大家的看法莫衷一是，总之它就是一个随着人类实践而不断变化发展的动态概念。从马尔萨斯最早从人口学分析贫困的原因开始，再到美国学者乔治·亨利在《进步与贫困》一书中从制度上分析贫困的根本原因，但无论是收入贫困，还是能力与权利的贫困，这些学者从经济学与社会学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解释。国内学者关于“贫困”的解读是随着政府扶贫工作的推进和扶贫政策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与完善的，不难发现关于“贫困”的解读中都包含一个核心词汇，即“缺”，因生存

¹ **作者简介：**王芳（1966—），女，社会学博士，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军（1986—），男，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研究生。

空间与物质资源的缺乏、个人能力和权利的缺失而无法维持生命存在。

如果贫困是因生存空间和物质资源的缺乏，以及个人能力和权利的缺失，那么发展就是拓展生存空间和提升个人能力与获得相关权利的过程。发展这一概念一开始是源于生物学对生命起源的认识，在这里它具有有一种维持生命的基本意义，其发展的目标就是要实现生命的维持；在中世纪基督教的教义中，发展是人为了洗刷自己的原罪，请求上帝救赎，其目标是成为上帝的子民，进而可以达到来世的彼岸。然而随着启蒙运动、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和殖民主义的扩张，人们对“贫困”与“发展”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使得“发展”的意义进一步升华，发展意味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让人类有了摆脱贫困和自然束缚的可能，人们逐渐建立起物质增长的发展观，并不断追求物质财富的积累与增长，但这样的“发展”却局限在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范畴。

2. 多维视角的思考与解读。

在经历了人类史上最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二战后世界发展的主题，相继取得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开始了漫长的国家建设，其中反抗贫困谋求发展的实践不断深化着人们对“贫困”与“发展”的理解，开始意识到发展不是数量上的绝对增长，而是具备生态特性的生活质量的提高。“贫困”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造成贫困的原因也是多样且多维的，包括物质的、文化的和社会等原因，如教育落后、基础设施不完善、经济结构失调、地区安全问题频发等。当前，贫困不仅与人类生活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也与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因素互相影响。而当前人类对于“发展”的认识也已经升华到“可持续发展”阶段。随着人们对“贫困”与“发展”问题认识的深化，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开始突破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束缚，纳克斯在 1953 年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认为低水平的需求与供给限制了家庭及其成员医疗保健、教育提高等福利的获得，这成为贫困在代际间循环传递的根本原因。^{[2] (p21-24)} 1956 年，纳尔逊提出了“低水平均衡陷阱”，试图从人口增长率与人均国民收入的角度来解释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贫困问题。然而这两种理论都指出解决贫困的问题关键是加大外部投入，事实上这种给予式的扶贫方式无法在实践中取得良好的效果。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在其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中，从权利的角度看待贫困问题，认为“贫困的实质是主体缺乏进行活动的基本能力，消除贫困就是要赋予主体以进行活动的实质自由，这一过程就是发展”。^{[3] (p17-19)}

3. 生态文明视角。

回顾人类的发展历程，最初的发展只是基于生物意义上的生存，后来是谋求人类族群的壮大，直到近代“托庇于”工业文明，人类开始了从物质上全面“摆脱”贫困的“战斗”，可是这却带来了环境恶化和“相对贫困”的交叉叠加，那么当前解读“贫困”与“发展”时我们就必须跳出“工业文明”视角的窠臼，以“生态文明”的全新视角重新审视它们，因为当前我们面对的是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复合而成的人与自然二者有机统一的复杂系统，人类与其他生命体都依靠这样的复合系统而存活，并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这个复合型的资源系统包括自然生态资源和人类社会资源两个方面，其具体是指人类得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资源、食物资源、政治关系、文化传承和信息传递等各项因子；从实践论的角度看，人类是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也在不断改变自然环境谋求生存中发展起来的。自然资源如果没有人类的加工也不会成为人类发展的必需品，所以说“实践是一种关系”，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或者其他人的关系，也是一种能力，是人类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人类想要生存与发展就需要食物，还需要必需的社会关系和信息交流等。在这个由资源系统和“实践能力”构成的“复合系统”中必然存在一个均衡区间，即生态适应位。也就是说，人类在发挥其实践能力改造自然并利用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的过程中，其能力发挥的限度必须要与资源能够承载的限度相适应。如图 1 所示， h 代表某个人类族群， X 代表资源系统， Y 代表人类的实践能力， X_c 到 X_d 这一区间代表资源的可利用量，则 $F_h(X_c, Y_c)$ 到 $F_h(X_d, Y_d)$ 区间就是上文所述的生态适应位，如果低于这个适应位，人类的生存会走向“物质的贫困”，而高于这个适应位，人类的生存将走向“生态的贫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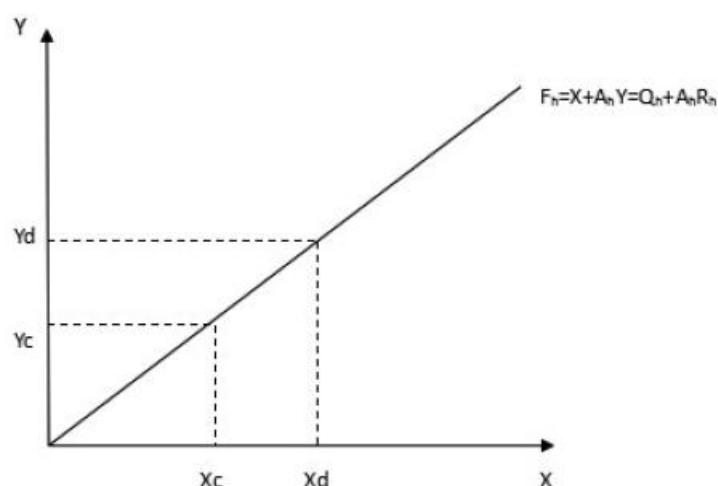


图1 生态适应位图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贫困”是人类在谋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实践能力超出或低于资源的承载力范围，即高于和低于生态适应位，由此而产生的人类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两个方面的短缺。而在这里的“发展”应该是人类在不断的发展进程中通过总结和反思，产生的一种理论上的更迭，在当下中国就是要以生态文明的理念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实践能力的跃升进而不断满足人的生物生命、社会生命与精神生命的需求，满足人们对小康生活的期盼，而“小康生活”的第一步就是要消灭“物质贫困”和“生态贫困”，进而走向美好的生活。

二、从“救济贫困”走向“精准扶贫”必然性分析

回顾宜昌市的反贫困谋发展的实践轨迹，可以发现宜昌市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反贫困思路、反贫困策略也有所差异。第一阶段是从救济开始的贫困治理，即1949年到1977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广义扶贫。当时宜昌市跟全国情况类似，处于“一穷二白”阶段，对特别贫困的人群采取人道主义式的物质扶助。第二阶段是解决温饱的扶贫之路，即从1978年到1985年的改革开放初期的制度性变革大规模地反抗贫困。当时宜昌市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坚持发展，在农村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解决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第三阶段就是从1986年到200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背景下的开发式扶贫。第四阶段从2001年到2010年的新世纪扶贫工作的攻坚阶段。第五阶段，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河北、湖南、甘肃、青海等地的过程中，充分了解了西部地区“贫困”问题，开始酝酿有别于先前的粗放式扶贫的思想；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调研时，第一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思想。随后湖北宜昌市便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全市范围内通过专项扶贫工作使得宜昌地区的扶贫工作不断走向生态与发展的高度和谐。

湖北省宜昌市经济发展迅速，自然环境优美，但是还存在着武陵山区和秦巴山区这样的连片贫困区。回顾历史，湖北省宜昌市从救济式扶贫走向生态化的精准扶贫不仅是地区自然环境资源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贫困地区提高扶贫效率和固化扶贫效果的必然选择。

1. 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基于生态文明的视角，在科学发展观理论指引下，宜昌市贫困地区目前拥有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像秦巴山区和武陵山区这样属于生态环境脆弱和自我修复能力差的生态脆弱地区，生态环境一旦遭受破坏将很难恢复。同时也因其交通环境恶劣和自然灾害频发，当地的经济发展严重滞后。

根据湖北省扶贫办数据统计，宜昌市武陵山区和秦巴山区的人均 GDP 在 2011 年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34%和 70%，可见经济发展比较落后。而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也只占全国的 60%和 62%，农民成为该片区最为贫困的人口，而其贫困发生率竟达到 11.1%和 54.7%，这已经比全国贫困发生率高出数倍。

贫困与脆弱的生态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宜昌市这两个贫困地区都是生态自然环境脆弱和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武陵山区地形复杂多变，耕地少，自然灾害频发；秦巴山区自然环境承载力差，如丹江水库工程造成当地的环境问题和农民的经济问题迭出。生态的脆弱性和自然环境的恶劣使得贫困地区人民的致富之路异常艰辛。但是如果贫困地区不顾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依赖高能耗和高污染的发展方式谋求当地的经济增长，必然会给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难以估量的破坏。这样的不计后果和透支子孙后代“生态资源”的发展方式是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当地的贫困问题，反而会造成更为严重的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只有以生态文明的理念为指导，走可持续性发展的扶贫之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宜昌贫困山区自然灾害频发、自然生态环境脆弱与经济成长的矛盾，才能走出贫困的历史怪圈。

2. 自然生态资源禀赋的基本要求。

宜昌市武陵山片区共有 11 个县市，其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矿产自然、水资源。秦巴山片区共有 10 个县市，处于国家南水北调核心水资源涵养区，具有丰富的光热资源和旅游资源。虽然这两个片区的自然资源丰富，但是其科学使用率很低。如何发挥这两个片区的自然生态资源禀赋，以及将其合理且绿色地转化为良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成为解决该地区贫困问题的重要思路。

宜昌市地处鄂西山区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气候温暖湿润，物产丰富。其中贫困地区的动植物资源丰富，武陵山区地处热带向温带过渡地区，其森林覆盖面积达 63%，有着药材、柑橘、茶叶、桐油等特色农业资源，如恩施市就有着“华中天然药库”的美称，咸丰市的“金丝桐油”驰名全国。秦巴山区受北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的影响，其森林覆盖率达 67.4%，并拥有药材、木耳、食用菌、板栗、猕猴桃等物产。温和的气候、丰沛的雨水、肥沃的土壤是宜昌贫困地区特色农业发展的良好基础。然而由于交通和产品竞争力的原因，贫困地区的动植物物产的利用率却十分低下，从生态文明的视角出发，贫困地区摆脱贫困的路径可以从生态扶贫角度发展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业，并使其在互联网时代走向农业现代化和产业的规模化，提高贫困地区自然资源的利用率。

3. 扶贫效率提高的基本路径。

第一，宜昌贫困地区的生态农业。宜昌市根据两个贫困山区的气候和自然环境，通过招商引资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拓宽了农民的就业渠道和谋生路径，实现了企业与农户的双赢，推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也实现了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增加的扶贫目标。宜昌市近年来通过各项举措鼓励社会企业加大对特色农业，如茶叶、果业、药材和养殖业等产业投资，推广特色生态农业，一方面可以减少对山林的破坏和开垦，防止水土流失，保护了生态自然环境；另一方面，生态农业的产业化却实实在在地给农民带来了经济效益，使得部分农民摆脱了贫困。

第二，宜昌贫困地区的“绿色”工业。宜昌两大贫困山区的工业主要集中于工业园区，其中安置了各市县招商引资和本地发展的高科技、低排放和能耗低的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同时宜昌市利用山区的充足的光照资源和水资源，开发并合理利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资源，五峰在 2016 年就有了首个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通过此类新能源助推生态低碳循环工业，这样既能够发展经济，又能够保护生态环境，最终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共赢。

第三，宜昌贫困地区的生态旅游业。宜昌两个连片的贫困山区有着天然的自然资源优势悠久的历史人文积淀，因此其在旅游业方面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优势。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在旅游业方面每获得 1 元的收入，就可以带动 4.3 元的相关产业的收入。宜昌市充分发挥武陵山区和秦巴山区的旅游资源优势，推动当地的旅游业快速发展，一方面可以解决当地人口

就业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当地贫困人口开展与旅游相关的服务产业提供了可能，拓宽了增加农民收入的渠道。因此，生态旅游业对宜昌地区实现精准扶贫的绿色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提高精准扶贫效率的基本路径之一。

三、精准扶贫：基于生态文明视角的扶贫实践

自人类诞生伊始，饥饿和贫困一直是人类族群和人类社会发展壮大的巨大障碍。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饥饿与贫困几乎如影随形，甚至常常成为王朝更迭的导火索。新中国建立后政府相继通过救济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这两种扶贫方式推进扶贫工作，大幅地减少了绝对贫困人口，经过多年的努力，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贫困水平有了较大降低，但是贫困地区“边角”的自然生态环境依然脆弱，贫困人口依然“无力”生存。当前，宜昌市的贫困地区主要集中两个片区，即武陵山区和秦巴山区，共 21 个县市，“这些地区的总体承载能力较弱，局部区域资源环境已经超载；生态安全屏障功能突出，承载能力要素间变化响应敏感；自然灾害事件等客观因素加剧了贫困地区资源环境压力”。^[4](p101-111)] 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分布特征和资源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使得脱贫攻坚任务呈现复杂性与特殊性叠加的特点。

精准扶贫作为当前党和政府扶贫工作的重要战略布局，它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在系统地回答了“贫困”与“发展”问题后，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一种战略抉择，也是我国深化改革谋发展的重要环节。基于生态文明的视角，宜昌市在推进精准扶贫的过程中，不仅考量了提高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的发展能力和实践能力，也考量了贫困地区的资源生态承载力，这使得当前的精准扶贫工作变得更加复杂、特殊和艰巨。宜昌市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有序地推进精准扶贫工作：

1. 更新发展理念释放发展动力。

理念是精神，是灵魂，是信念，是行动的先导。我国扶贫工作的实践轨迹告诉我们先进的理念是保证扶贫工作顺利推进的关键所在。如果没有对“贫困”与“发展”问题深入的理解，没有先进的发展理念，我们当前的精准扶贫将落入发展的困境。基于目前环境资源趋紧的现状，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需要考量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为重要的是要考量其生态效益。宜昌市从生态文明的视角来看待精准扶贫，以生态文明的理念、可持续发展观和生态整体观来审视当前的精准扶贫。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在提高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生计能力的同时，宜昌市还认真考量提高后的生计能力会不会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所以在精准扶贫中，宜昌市同等考量扶贫工作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目前宜昌地区共计有 243 个贫困村，相对贫困人口依然有 44.3 万人之多。基于宜昌地区分布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特征，在提高贫困人口的生计能力和拓展贫困人口的生存空间时，还需要解决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把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环境问题捆绑起来进行整体性考量。在宜昌市精准扶贫是一种“对症下药”的反贫困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既是基于以人为本的发展思路，也是一种基于生态整体观的有规范和有约束的可持续性和协调性的发展之路。

2. 精准的寻找贫困地区的生态适应位。

根据宜昌市长期的扶贫开发实践，通过研究发现要实现精准扶贫就必须掌握一个地区的区域特点，就是这个地区的资源系统（图 1 中的 X 轴）。按照前文 $F(X, Y)$ ($c < x, y < d$) 的生态适应位的分析，某一人类族群在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若干摆脱贫困的点，其中 X 介于 X_c 和 X_d 之间，求得： $F_h(X, Y) = M_h \times F_h$ ，这就是 h 族群或者地区发展的最佳生态适应位，在这里 $F(X_c, Y_d)$ 和 $F(X_d, Y_d)$ 就是生态适应的临界位。而当 $F_h(X, Y)$ ($X, Y < c$) 时，人类族群就走向贫困，生存就出现了问题。

精准扶贫就是要寻找准贫困的原因，弄清帮扶谁的问题，这就要我们精准分析贫困地区的资源系统（X 轴）和实践能力（Y 轴），才能为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对症下药，宜昌市在扶贫工作中提出：首先，对资源系统进行精准分析，对于自然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贫困人口可以通过改变资源系统的方式，即以生态移民的方式进行易地搬迁并进入有合适资源系统的地区；其后，对于“实践能力”不足的贫困人口可以采用提高其生计能力的“授其以渔”的方式进行扶贫，但是也要考虑到资源系统的

可承载力，不能在解决“物质贫困”的时候带来“生态贫困”。

3. 精准地把握贫困地区的实践能力——资源系统矩阵。

根据生态文明的理论，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能力不能超出资源系统的承载限度，也就是说人类的实践必须符合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基调。如何精准地把握贫困地区的形势？宜昌市在精准扶贫中提出了首先要明确宜昌地区的资源系统，即宜昌地区人民群众的可生存空间；然后再去考量宜昌地区人类族群对资源和环境的适应能力，即宜昌地区人民群众的实践能力。在实践过程中，具体到某一贫困县市，就可以从人口数量、资源可开发量、生态圈承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指标去衡量该地区发展的资源系统，与此同时，再从该县的人类族群的适应能力出发，通过该县市的生产力水平、经济发展速度、人口的知识量和技术水平等多个维度去考量该人类族群的实践能力。综上，描述某县市的实践能力——资源系统的公式可以表达如下：

$$F_h = \sum_{h=1}^n (Q_h + A_h R_h) F_t = \sum_{t=1}^n (Q_t + A_t R_t) \\ F_h F_t = \sum_{h=1}^n (Q_h + A_h R_h) \times \sum_{t=1}^n (Q_t + A_t R_t)$$

其中 h, t 表示两个不同县市， F_h 代表该县市的生态适应位， Q_h 为 h 地区的资源系统总和， R_h 为 h 地区的人类族群的实践能力， A_h 代表 h 地区的人口数量； Q_t 为 t 地区的资源系统总和， R_t 为 t 地区的人类族群的实践能力， A_t 代表 t 地区的人口数量，精准扶贫就是要寻找不同地区的人类族群的生态适应位。通过系统地分析不同县市，不同人类族群的实践能力——资源系统矩阵， h 县和 t 县在贫困根源上会有所不同，有资源系统的因素，也有实践能力的因素，因此宜昌市在实践中既分析了解贫困县的自然生态系统状况，也对其生产力水平、人力资源状况、技术水平等进行分析，才能在扶贫工作中做到服务对象精准、项目实施精准、资金安排精准、人员配备精准。

理论上的论述是基于一个较小地区的精准扶贫所作的分析，就中国目前贫困地区的分布特征而言，贫困地区基本是成片存在的，所以现实中的扶贫工作不是理论分析中的某个小村子的扶贫工作。现实扶贫工作那至少也是就地区而言的统筹协调，所以在精准扶贫中进行资源配置时，要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贫困户的总体资源系统的宽度，以及贫困地区间的资源系统的相似性和互补性，避免贫困地区之间发生生存空间的重叠和恶性竞争；由于人类实践能力具有很多的相似性，所以现实扶贫中要避免不同地区或者同一地区人类族群生计能力的重叠，尽可能在生计能力方面形成优势互补；贫困地区的资源系统，不管是自然生态的资源，还是人类社会的资源，都不是取之不竭的，所以扶贫中对贫困地区的“实践能力”的发展要考虑到当时当地和相邻地区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承载力。综上，我们在扶贫中需要构建一种基于资源系统——实践能力矩阵的协同机制，以此来拓宽贫困地区的生存空间和资源系统宽度，促进贫困地区间的协同发展，从而实现扶贫的精准化。

4. 精准地创造贫困地区发展的内外环境。

贫困地区以生态文明建设为重要抓手的精准扶贫，就是要发挥贫困地区原有的生态优势，通过市场化的方法来扩展资源系统的宽度和生存空间的维度，并谋求贫困人口“实践能力”的提升，这需以市场化扶贫为导向，国家相关政策为基础，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这样才能实现贫困地区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共赢。宜昌市在精准扶贫的攻坚过程中从以下几个方面为扶贫工作创造良好的内外环境：

首先，完善市场化的扶贫机制，保障精准扶贫的长效性。在实践中，宜昌市通过紧密结合生态文明建设与精准扶贫，并找到了能够培育经济贫困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市场需求，寻找贫困地区、贫困人口与生态产业协调发展的结合点。无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还是精准扶贫的拓宽生存空间和提高生计能力的建设，都需要得到市场的认可，也需要靠市场经济来

实现，从目前市场的需求状况和发展趋势来看，市场需求越来越青睐于生态和环保这样的主题产品。因此，宜昌市在实现精准扶贫中“立足生态文明建设，大力发展生态产业，提供绿色环保产品，打造良好的人居生态环境”，为扶贫工作和扶贫产业拓展经济市场。^{[4] (p45-46)}宜昌市鼓励湖北昭君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以扶贫为工作重心，通过企村共建和整村推进，积极推进白茶产业的扶贫工程，并产生了有效的市场需求。同时宜昌市商务局还帮助 243 个贫困村发展电商，培养扶贫带头人三千多。

第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贫困人口在谋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都存在各自的生存短板，政府需要根据扶贫对象的现实需要和发展特点，解决贫困群众急切关心的饮用水、硬化道路、医疗卫生、教育培训、能源补贴和基础绿化等问题，解决贫困群众提高生计能力的后顾之忧。宜昌市一方面加强了生态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对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和对贫困村村貌的整治，以及对村庄的综合卫生整治，以此来优化贫困地区精准扶贫工作的外部环境。

第三，完善基于生态发展的精准扶贫政策。在扶贫工作中，宜昌市一方面重视市场化的扶贫，另一方面还重视政府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致贫原因是多样，在精准扶贫过程中，需要对症下药，才能拔除“穷根”，这就需要国家在政策层面给予政策倾斜。当前中央和地方都相应地出台了生态扶贫和生态补偿式扶贫的相关政策，通过绿色可持续的扶贫可以在改善生计的同时维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宜昌市近年来根据本地区的扶贫实践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政策文件，特别是根据“十三五”脱贫攻坚任务，宜昌市扶贫办出台了《宜昌市 2017 年扶贫开发工作要点》，这对今年宜昌市的精准扶贫工作进行了系统的统筹安排。

$$\text{Max} F_b F_t = \Delta C \left[\sum_{h=1}^n (Q_h + A_h R_h) \times \sum_{t=1}^n (Q_t + A_t R_t) \right]$$

因此，某一地区的精准扶贫需要考量贫困人口的“实践能力”与贫困地区的“资源系统”两个方面。但是之外的变量 (ΔC) 同样重要，如果没有市场化的精准扶贫、没有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完善的精准扶贫政策，我们的精准扶贫工作即使能够摆脱“物质贫困”的困境，却会导致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堕入“生态贫困”的困境。所以，扶贫政策不仅需要考量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也需要考量生态效益，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贫困地区扶贫工作效能的最大化，进而在实践中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精准扶贫工作的良性互动。

5. 科学地构建精准扶贫的评估体系。

如何有效地评估精准扶贫的成效，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具体的实践问题。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增长话语体系是立足于社会消费的物质增长，通过巨大化国民收入，来完成国民追求幸福生活的目标。而我国以往的经济评估体系也过于注重经济总量的增长和增速的提高，这带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一系列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鲜明地提出，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5] (p1)} 因此，宜昌市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构建了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重考量的科学评估体系。每个地区的评估体系必须根据当地的生态环境承载力构建起一套考量精准扶贫的生态长效性的方案，所以这就存在地区性的差异，当然这套评估体系也有着一般性的要求和准则。

(1) 要体现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价值选择原则。精准扶贫不仅体现了人类“生命基本需求”的价值选择，也体现了人类族群对自然生态环境需求的价值选择。这样的价值选择一方面强调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能力和谋求发展的生计能力的拓展对于人类族群发展重要性；另一方面同样指出人类所生存的自然环境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2017 年宜昌市扶贫发展工作要点》中就明确指出了精准扶贫这样的发展方式不仅要取得物质的富足，也要谋求生态的富足。

(2) 科学的评估体系不仅要评估扶贫的质量、扶贫的进程，还要评价扶贫的成本、扶贫的生态环境影响。精准扶贫是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出发点，并将生态文明的理念、协同发展的理念、可持续发展观和生态整体观融入其中，将是否能够

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否能够让贫困人口重获幸福感，是否能够在经济发展和物质增长的同时兼顾生态环境的保护作为扶贫工作评价的标准。这一标准不仅将物质财富的创造作为发展的目标，也更加注重精准扶贫中的生态环境保护；扶贫的标准不只是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的需求，而且也有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其中包含了营造美好的生态环境和居住环境。宜昌市通过整村推进、扶贫搬迁、雨露计划、信贷扶贫和产业扶贫等扶贫工程推进精准扶贫工作，同时也出台了《宜昌市特困村脱贫攻坚行动考核细则》，其中对扶贫的质量、扶贫的进程和扶贫的生态影响的评估进行了细化。

（3）精准扶贫不仅是关于马克思学说中“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的具体实践，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贫困”与“发展”问题的深入思考与再实践。应该说，精准扶贫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用新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来“终结”以往的粗放式扶贫，构建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发展理论体系和实践过程。这种新的精准扶贫方式解决了“什么才是好的发展”、“为了什么发展”以及“为了谁的发展”等问题，意味着中国的扶贫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将彻底解决困扰了中国几千年的“贫困”问题。

四、结论

本文以湖北宜昌市在武陵山区和秦巴山区 21 个县市的精准扶贫工作为研究重点，指出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扶贫对于宜昌市连片贫困区精准扶贫工作推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强调武陵山区和秦巴山区作为宜昌市生态文明建设和精准扶贫的主战场，两者的良性互动是宜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实现同步小康的重要保障。宜昌市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引，通过更新发展理念，寻找贫困地区的生态适应位，把握贫困地区的实践能力——资源系统矩阵，创造贫困地区发展的内外环境，科学地构建精准扶贫的评估体系，最终使得宜昌市实现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精准扶贫在实践中的良性互动与精准扶贫理论的创新。

参考文献：

- [1] 纳克斯. 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M]. 北京：商务印刷出版社，1966.
- [2] 王鹏飞. 贫困与发展理念——阿玛蒂亚·森经济伦理思想研究[J].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1）.
- [3] 周侃，王传胜. 中国贫困地区时空格局与差别化脱贫政策研究[J]. 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1）.
- [4] 何文毅.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实现精准扶贫[J]. 当代县域经济，2016，（9）.
- [5] 中共中央宣传部. 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M]. 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 .